

洪鎌德教授
七十華誕專輯

國家發展研究

JOURNAL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石之瑜 曾倚萃 郭銘傑／並非客觀性問題 —從文化研究立場回應的一次嘗試	1
林若雱／二十一世紀初東南亞的安全策略與大國關係 —兼論台灣因應之道	29
林沁雄／近二十年來我國對外投資之起因 —批判實在主義之研究取徑	67
洪茂雄／中東歐國家與歐盟統合之現狀和前景	99
施正鋒／原住民族的主權	117
陳顯武／法律的政治分析 —論戒嚴時期的政治刑法	155
黃瑞祺 黃之棟／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 生態視角	171
楊世雄／馬克思宗教批判之批判	197

國家發展研究 第六卷第二期
2007 年 6 月 頁 1-28

並非客觀性問題 —從文化研究立場回應的 一次嘗試*

石之瑜**

曾倚萃***

郭銘傑****

* 本文首講於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民 95.12.28.），後經三位作者共同整理完成。
** 台灣大學政治系，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台北市徐州路 21 號，cyshih@ntu.edu.tw。
***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高雄市西子灣蓮海路，b90302241@ntu.edu.tw。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台北市徐州路 21 號，minjay.guo@msa.hinet.net。

摘要

藉由譬喻與邏輯推論，本文嘗試以文化研究立場回應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概念。文章指出，研究對象之所以成為可識別的觀察對象，首先必須具備時間與空間上的延續性與斷裂性，而這種延續性的斷裂必須通過符號，才能為研究者所認知。但是符號的使用與產生，涉及學習，而學習隱含了社會目的，社會目的影響接收符號的觀測工具，並且賦予每一項符號某種具有情感性質的記憶，因此導致主觀與客觀之間無法區隔，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相互構成，以致於不能符合社會科學對於主客觀二元對立的知識假設。

關鍵字：社會科學、客觀性、主觀性、知識論

研究者介入客觀性

許多人認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是一種關於主觀的研究，¹因為研究的是人的精神狀態，無時無刻不需要靠研究者的主觀判斷，因而不能成為一個客觀的對象。的確，文化研究者所關注的，往往不是區隔主觀和客觀，而是記錄理論與實踐兩者相互構成的現象，亦即生活理論的學習促成了社會行動，社會行動回頭修正了生活理論，理論與實踐之間相互辯證，社會過程得以生生不息。相較於此，區隔主觀與客觀的要求，首先所處理的不是研究對象的主觀世界，而是研究者自己的主觀世界，蓋研究者假定研究對象的行動是客觀，研究者的研究是主觀。主觀與客觀的區隔形同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區隔，乃是為了避免研究者的主觀判斷進入研究過程而不得不進行的區隔。為了完成這樣的區隔，研究者於是連帶避免介入研究對象主觀的理論世界，而專注於他們的行動，經由觀察、歸納與演繹，從研究對象的行動中，得出不受研究對象主觀的理論世界所影響的客觀通則。相形之下，文化研究者試圖介入研究對象主觀的理論世界，會模糊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區隔。

相對於社會科學強調的實證研究，當代所謂的文化研究者頗為不同，他們試圖進出研究對象的生活，視研究對象與研究者之間存在相互關係，承認每一位研究對象與研究者都是平等的知識來源，拒絕追求普世性的行為法則，認為一般性的文化規則與社會定律是教育學習與政治操作的結果，進而致力記錄歷史偶然機緣下的不確定感，強調研究對象具有不可規範的能動性，鼓勵多元且看似矛盾的文化實踐。社會科學批評文化研究的，正是在於後者介入研究對象的理論世界後，上焉者儘管仍戮力轉化翻譯研究對象的邏輯，以使得作為行動者的研究對象的主觀

¹ 例見 Andrew Nathan, "Is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Distinctiv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3: 923-936.

世界，能為研究者社群所理解，但顯然仍舊不能建立不受研究對象主觀世界影響的通則；下焉者甚至改而臨摹研究對象的語言，從而益加無法與其他研究者溝通，這樣的研究如同文學寫作，不屬於社會科學。²

社會科學家之所以要區隔主觀與客觀，因而是為了服務研究者社群用的，故文化研究者在答覆時，不應該侷限在只顧闡明行動者主觀的理論世界有何意義，而應該追根究底反省我們身為社會科學的研究倫理。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自我質問，一般社會科學的研究倫理奠基在主觀與客觀的區隔上，是否適當？文化研究者處理這個問題的方式，是透過大量的研究實例，來說明研究者不可避免地一定會介入研究對象，並據以在邏輯上說明人為區隔主觀情感與客觀對象之不當。本文以下是一次超越主觀與客觀的嘗試。

客觀性現象的不客觀

生命的非客觀性

主觀得以發生的重要基礎應該是生命吧！但生命是否是客觀現象呢？九一一事件時舉世見證了聖戰士摧毀雙子星大樓，其後中東地區又傳多起人身炸彈事件，包括女戰士在超級市場自殺攻擊。在科學認定裡，他們就是「死了」。但一位懷孕婦女自殺攻擊後，記者訪問她家人，他們咸信死者精神長在。「精神長在」算不算還活著？家人的反應點出一個根本問題：誰能定義死亡？

醫界常辯論是否可以拔除植物人維生器的問題，有人說如此是謀殺，也有人說植物人已無生命，於是「腦死」成為現代人對死亡的新定義。那麼，犯了重罪的「行屍走肉」或「出賣靈魂」的人算不算腦死呢？

² 參見管中閔，〈科學主義必須“謙卑執政”〉，於《社會科學知識新論》（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社，2005），頁 11-13；吳玉山，〈政治學是科學嗎？〉，於《政治學的知識脈絡》（台北：五南，2001），頁 9-12。

與此完全相反的例子是托夢，往生後對親人的托夢是屬於誰的主觀？是親人的主觀，還是往生者的主觀？行屍走肉隱喻的是，醫學定義的生命不是發生主觀的充分條件，即有生命未必有主觀；托夢隱喻的是，醫學定義的生命不是主觀的必要條件，即沒有生命仍然有主觀。醫學不處理這問題，畢竟醫學研究議程須先經縝密定義。不過，這些例子都令人聯想到「將死未死」狀態的可能性。

行屍走肉或托夢似乎都是旁觀者的主觀想像，但腦死的定義不也是來自旁觀科學家的主觀思想嗎？誰有資格來定義腦死？是需要通過考試，取得執照的醫生或檢察官嗎？但他們參加資格考試時，出題與評分者又是否客觀？何況為了考照而研讀參考書，也是看似主觀的決定。所以，死亡這樣一個現象的判準，涉及大量的所謂主觀的培養與定義，所以問題不在於區別主觀與客觀，而在於定義，社會上實踐同一個定義的人夠多，就號稱客觀，不夠多，就視為主觀。精神分析稱這種接受同一定義人數夠多的現象為社會共識下的客觀（social consensual reality），故造成客觀現實的相對化，在相對化下人數微弱的一方可能如同精神病患。發生在政治領域裡，著名的有前蘇聯古拉格群島，在第三帝國被認為是同性戀根源的猶太裔，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反革命或修正主義者。時空遞換以後，過去共識的病態反而成客觀，地圓說與天體論從而從病態轉為正常。

數字的非客觀性

死亡這個例子也許不夠好，因為涉及太多情感，所以定義時會因情感狀態不同而採不同角度。那麼，不涉及人生經驗的純粹邏輯—— $1+1=2$ ；若 A 則 B 且若 B 則 C，則若 A 則 C——如何？西洋哲學史長久的困惑是，世上有沒有真理？³有的話如何知道？這個問題的發源是宗教

³ 參見 Paul Vincent Spade, "Medieval Philosophy," in A. Kenny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性的，是從所謂黑暗時代進入啟蒙以後，科學家才開始追問，有沒有一種不經人為介入的、屬於上帝的真理？充滿懷疑的笛卡兒雖然說，我思故我在，⁴但他為了克服懷疑，終究訴諸形式、符號、數理的純粹邏輯去測量存在。

不幸的是，認知心理學家新近發現，數字不是客觀的。原本決策分析當中常用決策樹（decision-tree）的方法，根據某幾種不同方案的成敗機率與各自最後的利弊大小，運算操作得出不受主觀影響的優先順序。⁵但心理學家最近提出設想理論（prospect theory），⁶指出人在不同處境下，對於同一個機率有不同偏好，這個偏好不但受情境影響，更受當事人情感狀態所影響。當然心理學家仍在追求通則，進而發現，一般人在損失狀態下風險傾向增加，在利得狀態下會比較保守；故得與失處境的不同，影響一般人面對特定機率時的風險傾向。故一個人贏了錢便不急於繼續賭，輸了錢則會想繼續，儘管輸贏的機率並未變動。

更大的問題是，心理學家進一步發現，當機率變得極大或極小時，人對機率的偏好變得不可測，⁷亦即人對於機率本身的好惡不能事先判斷，也就是說當下瞬間的判斷，每次都會重新決定機率的意義。比如，墜機的機會極低，但是這個極低的數字對具體的人有何意義，是無規律的。可見，即使像數字這種不受生活經驗影響的純粹定義系統，其意義也不能講定，這種「無規律」性是否可稱之為一個真理？

數字的不客觀還表現在統計測量必須依賴在研究者設定的前提條件上。以不同方式來定義所欲測量的變數，受測的變數將會被測量出不

⁴ 起碼，不論我如何受到欺瞞，至少當我思考我自己存在的時候，一定有一個思考的主體存在著。

⁵ 參見入門決策分析的經典教科書，Edith Stokey and Richard Zeckhauser, *A Primer for Policy Analysi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78)。

⁶ 中文也有翻譯為前景理論，參考二零零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 (eds.), *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⁷ 有關介紹，見 Jack Levy, "An Introduction to Prospect Theory," *Political Psychology* 13, 2 (1992)。

同的結果。準此，數字的不客觀使得中國經濟成長率究竟有沒有灌水的問題，困擾了大批的中外經濟學家與政治學者。在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是樂觀還是悲觀的預期上，參與論辯的雙方同樣也是各執一詞。只見越來越複雜的計算和預測模式隨著論戰的發酵而接二連三地被提出，可是這些聲稱客觀的測量並沒有讓我們對中國經濟成長的掌握增加多少，則究竟那一個研究者的前提假設才是客觀的呢？⁸

除了理論家下定義是對研究對象行動意義的介入，一般人作為行動者，面對生活情境時有各種情感，也經常必須下判斷，行動者面對自己如同研究者面對研究對象。研究者面對研究對象時，與研究對象面對生活情境時，兩者處境類似，會根據自己的需要（或目的）做出具有定義作用的決定。以下試舉數例。

研究者的目的與足夠客觀

觀察雲的多元工具

社會科學家對於雲的困惑由來已久。美國政治學會機關刊物 *World Politics* 最早邀請學門大師級學者 Gabriel Almond 探討方法論時，就是以雲為類比。⁹Karl Popper 形容科學假設的形成期，形容詞就是雲狀階段。¹⁰觀察社會現象如同觀察雲，觀察者站的位置影響觀察，遠看有雲，但走近時便無法判斷雲的邊界。接近了雲，或進入了雲，還能觀察雲嗎？一般人不能客觀地界定雲從哪裡開始，但自然科學家可以，所謂雲不過就

⁸ 鄭竹園，「中國大陸總體經濟發展與穩定」，載何思因、陳德昇主編，《中國大陸研究方法與成果》（臺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 92 年）。

⁹ Gabriel A. Almond and Stephen J. Genco, "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29, 4 (July 1977): 489-522.

¹⁰ 引於 Rom Harré, *The Philosophies of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50; 另參考 Karl R. Popper, "Of Clouds and Clocks: An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Rationality and the Freedom of Man," in Popper, *Objective Knowled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p. 213.

是水分子的密度，密度大了就成為雲，所以可以透過定義密度來界定雲從那裡開始，如此便可達到客觀。

依據水分子密度的定義，有可能與我們主觀視覺感受或語言使用相反。譬如根據密度定義不是雲，但在遠距離外看起來仍然覺得是雲，或根據密度定義是雲，但在一個距離外看不出。一般人直觀的雲經過定義之後與直觀的感覺有出入，當客觀定義顛覆了一般意義，算不算是有有效的定義呢？自然科學家介入了雲的定義，從而改變了雲的意義，進而影響到觀察對象的存在形態。

藝術家用雲的意象來創作，但是如果科學家去實際測量創作時的天氣狀況，發現水分子沒有到達定義的密度，能否據以否定藝術家的創作價值？也許藝術家可反駁科學家用來測量雲的是儀器，而藝術家使用的是眼睛與心靈，只要感覺到與周邊區隔的現象，就構成雲。所以能不能「看到」雲，因藝術家和科學家各自觀察工具不同而異，而觀察工具不同是因為目的不同，一個是用雲的意象來表達創作，另一個是要測定雲的組成成分。可見科學的「客觀」不但來自定義，也來自用以觀察的儀器。但即便科學家使用儀器也有限制，並非任何時空情境都能用。能不能用乃與遠近距離有關；在遠處用肉眼可以看雲，而使用儀器的科學家無法測到遠方水氣，反而等於看不見，然而身在雲中，肉眼無法分辨雲起何處，測水分子密度的儀器反而能派上用場。

影響觀察的因素，除了工具與距離以外，觀察時間長短也帶來差別。觀察很久或觀察一剎那的結果大大不同，因為雲的狀態會轉變，可能會揮發，風會吹散它，太陽蒸發它。對藝術家而言，看到不同形狀的雲引出的想像和描寫便不同，所以雲的形狀很重要，而因為不同時間點看到的形狀不同，時間因素就顯得很關鍵；但對科學家而言形狀並不重要，因為不同時間點看到的水分子密度是同質的。

準此，「客觀」的觀察首先需要一個定義系統，與根據定義可用於進行檢驗的儀器；另外，儀器與觀察對象的距離、觀察的角度、觀察的

時間，在在與觀察者的目的息息相關。如同瞎子摸象故事裡的象，每人摸到的部位不一樣，想像出來的象也不一樣，那麼象（或雲）到底存在不存在？會不會有某些人認為象存在而一群旁人認為象不存在的兩種或多元（multiple）客觀的可能性？¹¹也就是當下不存在已獲得到共識的客觀，或當下存在這種共識，但不存在可以持久的共識。

足夠客觀的原子與國家

量子是一種無法準確測量的物質，它除了本身的質以外還有波，處在波動狀態的量子，卻因科學家觀察它時形同是靜態的，故而無法記錄波動，觀察中的量子無波動於是不成其為量子。最著名的例子是薛丁格（Erwin Schrödinger）根據量子的性質提出一個藉由觀察貓的死活來測量量子運行方向的實驗。薛丁格把一隻貓置於一個密閉箱子裡，當量子在左就釋放氧氣，貓得以存活，反之若量子在右就放毒氣，貓便死亡。在薛丁格打開箱子之前，量子持續波動，貓處在一種無法決定是生或死的狀態；一旦薛丁格打開箱子，貓就處於非死即活的狀態。¹²量子這種性質足以啟示研究者，研究者的介入影響到觀察對象存在的樣態。

量子波動是非常微觀的層次，到了原子的層次以上，已經是可以觀察的穩定狀態，不會因觀察者介入而改變原子的存在狀態。社會科學研究中已經出現異曲同工的本體論，如近年國際關係學界關於「國家」的辯論屬之。論者謂，即使國家只是人類歷史上偶然實踐出來的虛構，並非必然的存在，且每一個國家由於形成過程與歷史背景不同，其國家性質也有所不同，然而今日國際關係運作已發展到當下這個階段，國家的存在不可改變。¹³故國家像是原子，在國家以上的部分已經是穩定狀態。

¹¹ 多元客觀又謂之為強客觀，參見 Sandra Harding,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91).

¹² 丁致良，〈量子貓的故事〉，《物理學雙月刊》，19, 5（1997），pp.439-449。

¹³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 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London: Taylor & Francis Ltd, 2005).

至於在國家層次以下，的確可以發現各種歷史背景與社會文化差異，從而各自對國家的理解與使用也有所差異，並且在實踐國家身份時會表現出很多不同的意義。可是，一旦到了國家層次之上，就形同是原子層次以上的穩定狀態，上述的各種國家之內的差異不構成對國際層次客觀研究的障礙，於是可以承認國際關係中的國家是客觀的，且國際關係的各種知識可以在這個客觀的基礎上發展。

不過，即使量子測不準是在極微觀層次才有的現象，我們如何判斷對原子的測量不會改變原子的存在狀態呢？「測量」的本身有沒有可能改變存在狀態甚至行為通則的作用？

足夠用的解剖後的青蛙

被解剖的青蛙的器官，與沒有被解剖的青蛙的器官是否一樣呢？青蛙對於自己被解剖的命運，能夠體會到什麼樣的程度？青蛙在極度驚恐下身體器官可能產生的各種化學反應，可不可能改變被解剖的器官的存在狀態，因此不能適用於描述或解釋未被解剖的青蛙的狀態？生物學家可能認為，經解剖青蛙所得的關於器官的觀察，其準確程度已經「足夠」使其了解活青蛙的狀態，也就是說，解剖動作對於青蛙器官的存在狀態造成影響的可能性就算有，也不影響研究者獲得足夠充分的關於活體青蛙器官配置、功用與狀態的法則。

這好像是在問，青蛙是不是量子貓？我們的介入會不會改變青蛙的存在狀態？看起來解剖青蛙和量子貓不同，因為人的介入就代表青蛙一定死了，而且青蛙可能事先有感覺，量子貓沒有。但是，假設在解剖過程中，有時青蛙心臟還在跳，如此可以說牠已死了嗎？這種「將死狀態」對青蛙的影響，會不會影響到觀察結果？科學家對狀態進行定義時，其間人為介入的影響真的微小到足以聲稱不會影響「充分客觀」嗎？

足夠用的投票偏好記憶

這個疑惑在社會調查中造成更大困擾。「您上次投票給哪一個政黨」聽起來是個非常客觀的問題，但是有沒有可能受訪者不只是（甚或根本不是）回答問題本身，而是藉由回答問題與陌生的訪問者建立某種社會上共同接受的社會關係？雖然科學家說，「上次投給誰」這件事是已固定的事實不會改變，所以不管受訪者如何回答，他投那一票的結果是一個無法改變的社會事實；但心理學家發現，一個人在與他人溝通對談的過程中，對自己行為的描述不可能完全反映行為當時的精神狀態，往往之後的描述會取代行為當時的記憶，這幾乎已經是常識。所以當受訪者描述所「記得」自己投票給某人時，他對於投票過程、心情、理由等等的回溯都已經跟他當時的行為（投票給某人）開始脫離，那麼研究者要如何根據這樣獲得的「事實」進行分析呢？當然科學家可以堅持說，即使在社會互動進行過程中當事者的記憶已經改變，曾經投給誰這件事仍然是千真萬確無可動搖的事實，不能因為記不得就不承認發生過。

但是，投票者是否知道自己投的可能是廢票？¹⁴假如受訪者認為自己投給某黨，訪員也如此記錄，但其實那張票後來被判定是廢票而受訪者不知道，如此就連投給「誰」也是不能確定的事了。好在廢票與否對訪員而言沒有意義，因為研究者要了解的是受訪者的偏好傾向，收集了受訪者的政黨偏好，就能與其他的偏好及價值取向做相關性分析，建立理論。所以受訪者到底投票給誰，或是否不小心投了廢票，並不重要。不過，這樣的話，即使受訪者其實沒有去投票，也可以在受訪時說自己投給了誰，理論上也不影響研究。因為訪員要測量的只是受訪者的傾向（「想」投給誰），所以只要受訪者表達自己「想」投給誰，是否就算投票事實沒有發生，也可以讓訪員得到有一樣意義的結果。

¹⁴ 二〇〇〇年美國總統大選就發生選票打洞機未穿透時，如何判斷廢票的爭議，爭議經過大法官會議的仲裁，並影響到選舉結果，所以計票不能脫離主觀的判斷。

有關投票的這種客觀研究，顯然並非想像的那麼客觀，因為即便研究對象根本沒有投票的行動，研究者一樣可以對他投票的行為進行研究，而且一樣可以聲稱做出來的研究是客觀的，只是這種客觀與所假定的研究對象存在狀態的客觀不同。儼然這裡所說的研究的「客觀性」在於，對研究者而言，只要研究得到的結果足夠說明、解答自己設定的問題意識，就充分客觀了。知識的來源是靠研究者對研究對象存在狀態的定義，只要研究者覺得足夠「有用」就好。

回到了觀察雲的同樣問題，即一種知識有用與否，取決於研究者的目的。研究者的目的為何，影響研究者決定研究對象身上哪一（些）部份是可生產知識的原料，只要這些部分充分夠用即可。比如說一項藥物實驗，實驗者設置一個實驗組與一個控制組，將藥物施予實驗組，只要之後發生的效果可供判斷社會大眾吃了這些藥會有什麼效果，對藥廠而言，這樣的知識就足夠了。至於實驗組與控制組知道或不知道自己是實驗組或控制組的這件事是否會影響藥產生的效果，對於已經得到充分夠用知識的研究者而言便不重要了。但如果知識是充分夠用即可，那也必須知道怎樣算夠用？

研究者的目的決定所認為有用的知識要客觀到什麼程度是可接受的，畫家要知道雲的形狀，那是為了作畫的目的，關於水分子密度的知識沒有用也就不重要；科學家為了要測量水分子密度用了儀器，則肉眼或顯微不但都沒有用而且也都不重要。

觀察對象的可識別性

國家與國界的識別

能夠有用的東西必然先是可以識別的。畫家用肉眼便可進行識別，物理學家則需使用儀器才能夠識別；只要找到研究者能夠識別的對象，便可以進行研究，但把識別的過程這樣附著於研究目的，很難稱之為客觀。

回到國際政治學關於國家問題的辯論。正如原子之於量子的類比，假如說國家已是個可被客觀研究的穩定狀態，那下一個問題是：國家存在何處？我們如何知道一個國家的存在？判斷國家存在或不存在的直觀答案或許是根據國界，國界劃定之後，國界之內就是國家。

國界又在哪裡呢？¹⁵從外太空看地球的宇航員看到的山脈與河流就只是山脈與河流，根本不可能分辨中線，於是無從分辨所謂的國界。但等親身到達邊界前線，或將寸土必爭。在越南和中國邊界，中國工人修河濱公路時有碎石掉進河道，越南士兵就拿槍跑過來，認為碎石掉進河裡一經累積，會改變中線位置，從而影響國土大小。會不會真的影響，士兵其實不會知道，但是荷槍實彈跑過來，這個精神比國界更有助於代表國家。¹⁶

政治學家看到圍欄、通關與護照等國家權力象徵，就是國界；國際政治學家可能說，地圖上的界線就是國界；但對觀光客而言，他們只會

¹⁵ 主權疆界的定義在實踐中不但變化，以致於透過主權定義國家已經不敷使用，見 Cynthia Weber, *Simulating Sovereignty: Intervention, the State and Symbolic Ex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即使是國際政治學的現實主義者也有同樣的論述，認為主權概念隨著實踐已經分殊，國內主權 (domestic sovereignty)、互賴主權 (interdependence sovereignty)、西發利亞主權 (Westphalian sovereignty) 與國際法律主權 (international legal sovereignty) 要被分別看待，見 Stephen D. Krasser, eds., *Problematic Sovereignty: Contested Rules and Political Possibilit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¹⁶ 石之瑜，〈中國跨界民族身分策略中的國家意識——京族面對越族的區隔與聯繫〉，《文化研究》1 (2005)。

從地圖上一點移動到另一點，沒興趣注意到國界，因為他們只留心於山河美景或風俗文化，根本不留心護照與地圖上的線條，假如因為看到文化「差異」而發現已經跨越國界，這個國界通常不是政治學家所認為的國界。國界與雲比較，觀光客與政治學家的差異，不也像是畫家與科學家之間的差異嗎？

是否看到國界在什麼位置，或用什麼能力才看得到國界之類的問題，其答案影響國家這個「事實」，而答案與前述諸多行動者的目的和身份相關，如果沒有這樣的目的或身份，便不知道要用什麼樣的工具，若不知道用什麼樣的工具，就掌握不到對象，對象於是不能被觀察。由於對象必須要先可被識別，從而才可以被研究，於是這構成從事研究的大挑戰：如何去識別？很多研究對象無法被識別，因為研究者不生活在行動者所處的環境裡，故而陷於無知。很多與研究者的研究目的無關的現象，卻對被研究的當地人非常重要，比如解剖青蛙時，研究者是否一看到青蛙，就知道是青蛙？

日本知名中國學家溝口雄三舉過一個例子批評日本中國學研究，說日本好比一隻從蝌蚪長腳演變而來的青蛙，期待中國也是如同自己那樣的另一隻青蛙，隨時盯著看中國何時長出腳來，但假如中國不是青蛙而是一隻小雞，小雞長大後變成大雞，仍然還是兩隻腳，日本就認為中國還是貧窮、封建、落後沒有長大，日本因此無法理解為什麼中國好像越來越強大。¹⁷雖然這譬喻原是要批評日本的中國研究，但在此的啟發是：研究者不見得知道青蛙已經是青蛙，或青蛙其實不是青蛙。¹⁸

¹⁷ 還有用運動球襪做例子，來說明研究者錯誤根據自己穿襪子的習慣來判斷研究對象的狀態，見，《書評中國》（台北：翰蘆，1998），頁210。

¹⁸ 科學哲學常用的例子是，一隻與天鵝全同，但黑色羽毛的動物，是否屬於天鵝？亦即，黑天鵝是不是天鵝？

語言與可識別性

維根斯坦說過，語言是一種實踐（使用）。¹⁹語言不是對音或文的定義，我們並不去定義用來裝飲料的容器叫做杯子，事實上，在不一樣的文化裡，cup 與 glass 可以是一樣或不一樣的物品，有不同的用途。又譬如 spaghetti 和 noodle 對義大利人而言是不同的東西，但對東方人都歸類為長條型的麵製品。維根斯坦舉過一個例子，故事是，有個小孩看到獸皮卻以為是貓。小孩沒有使用過貂皮，故分不清貓與獸皮的差別。要分辨詞語意義，必須讓生活經驗與發音同時出現在一個情境當中，並且能與周遭的人分享使用這種聲音與情境的結合，彼此在音調、神情、情感等等方面相互交流，從而才能學會這個語詞的用法。

語言與生活關連的例子散見於生活中。國際關係研究中曾有以外星人為例，認為外星人如與地球人相遇，將會互動並發展出某些規範，藉此比擬地球上兩個相互陌生的國家接觸之後的情境。但多數人不認為自己看過外星人，故有批評者質疑為什麼要舉外星人為例？這個舉例隱含了對外星人的某種設想，因而才會把地球人與外星人是當作屬於同一本體論層次，且可以相互交流的對象。²⁰果如此，則表示外星人其實早已存在於提出這論點的地球人的觀念裡，外星人之所以出現其實是地球人為了要證明自己的理論而召喚來的；外星人根本不是來自外星，而是理論家為了發展理論，根據自身社會中既有的對外星人的想像，而勾畫出來的形象。

¹⁹ 故語言是一種不斷演出的遊戲，參考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53).

²⁰ 這個辯論記載於，Naeem Inayatullah and David Blaney, "Knowing Encounters: Beyond Parochi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Y. Lapid and F. Kratochwil (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Boulder: Lynne Rienner), pp. 65-84.

時空延續與斷裂

無論採取什麼觀察工具，指向什麼研究目的，被識別的條件是必須在時間與空間上都具有延續的性質。時間上，觀察者必須在一個時間點到下一個時間點能夠連續地認知到對象的存在，對象才可能被識別出來進而被觀察，故波動中的量子就構成問題；空間上，觀察者必須在所使用的觀察儀器（不論是肉眼、望遠鏡或顯微鏡）作用的範圍內，認知到對象與非對象之間延續性的斷裂，對象也才能被識別出來。觀察時間的連續，能使觀察者知道在空間中呈現的延續性確實存在。然而這並不表示任何具有時空延續性的東西都可以被辨識與觀察，如同觀光客與外交官作為觀察者，或青蛙與雞作為觀察對象，同一種延續性的展現對某些觀察者有意義，但對另一些人就沒有。譬如說，城市人看到桌椅，並不會將它們之間的用途混淆，但外星人未必知道桌椅是什麼，因為生活經驗裡沒有體會這些物品用途的人，不會意識到這些物品存在，或即使意識到，其存在意義也迥然不同。

在湘西生態保護區，扶貧工作隊要用鋼筋水泥搭建橋樑。但當地人覺得用石頭與木材搭橋即可，就算遇天災損壞也還可以重複使用又不會破壞環境，所以反對鋼筋水泥。工作隊駁斥的理由是，即使當地人可以用天然材料建造牢固的橋樑，都市人看到了仍然不安心——鋼筋水泥是他們在陌生叢林裡最熟悉的事物，有鋼筋水泥他們才敢走進森林，當地也才可能發展觀光進而賺錢。工作隊同時也希望遷離當地的聚落，因為當地人使用溪水洗滌，又砍伐山林為生活所需，污染了溪水與保護區。深山裡的鋼筋水泥對住在山裡的原住民很突兀，但對都市人反而極為自然，因為在陌生叢林裡有可辨識之物；反之，大山裡蟲鳴鳥叫對原住民極為熟悉，但都市人身在其中卻無法辨識。²¹

²¹ Chih-yu Shih, *Autonomy, Ethnicity and Poverty in Southwestern China: The State Turned Upside down* (London: Palgrave, 2006), Ch. 6.

可見，即使對象之於某位觀察者在時間空間上具有延續性，其他觀察者也未必能夠辨識到，能不能辨識仍舊與生活需要相關。譬如對於同樣一杯酒，一個近乎酒盲的人感覺不出任何特別之處，但另一個以品酒為職業的酒癡，淺嚐便知酒的名稱年份等等細節；一個酒癡會對酒的極小差別極度敏感，但一個酒盲就算面對兩杯完全不同的酒仍然覺得沒有差別，這是因為後者的生活中不需要品酒，但品酒卻是前者賴以維生的專業。說到底，人是否能夠在時空延續中辨識出差異，仍然要看行動者的目的與經年累月的學習和實踐。

能被辨識觀察的對象除了在時間與空間上具有延續性以外，還必須有另一個預設性質，就是這種延續性必須要斷裂。永恆的延續也是無法被觀察到的，空間上的延續只能到某一個定點，斷裂後形成範圍與邊界，從而可以區別並歸類。時間的面向亦復如此，生命起迄就是一種時間斷裂。如果我們在時空推移過程裡，發現某事物連續狀態發生斷裂，就表示我們已經辨識到其變化，於是能夠界定它、觀察它、將它作為研究對象。如果要進行科學研究，就需要解釋此變化與其他變數之間的關係是什麼，由統計相關性分析建立因果關係與理論。

研究者完全可以人為造成斷裂，有經驗的研究者能透過操作切斷對象存在狀態的時空延續性，便能夠進一步比較在不同斷裂點上的變化。無論如何，要成為觀察對象的必要條件是具有時間與空間的延續性及斷裂性。研究者有不同目的，據以擇定或製造某個其視野內的斷裂後加以觀察；斷裂是觀察的起點，這種斷裂可說是對觀察者「有用」的存在方式。

斷裂與延續的符號象徵

斷裂狀態的表達必須依附象徵符號。前面提過青蛙與雞的類比：青蛙、雞都是在特定目的之下，具有時空延續性與斷裂性的可被辨識的形象，而且它們都是社會上有用的形象，而藉由這樣的具體形象去類比兩個國家的狀態，青蛙與雞的形象在這個脈絡裡很鮮明。

但像「國家」這樣模糊的事物（因為對於其時空斷裂性質的界定莫衷一是），研究者必須藉由類比與象徵符號，才能變出自己可觀察的對象。這種必須經過象徵、代表、轉化才能被觀察到事物非常多：看到國旗、元首肖像，提示了一個看不到的、但必須保衛並為之犧牲的「國家」；聖戰士飛機撞進雙子星大廈殉教，反而提醒某些穆斯林關於「阿拉真主」的信念與「伊斯蘭教」的生命力；看到物體掉落墜地這一個在連續時間內連續的空間移動變化，提醒人們有一股使這變化發生的力量叫做「地心引力」——引號內的，都是透過其他東西的象徵、轉化，而成為研究者相信能夠證實存在的對象，而且它們都有一個以語言符號呈現出來的名稱。

工作單位也是這種必須透過象徵才能被觀察的事物。假設某人要去拜訪一家單位的領導，走進大樓，設想單位在某個樓層，期待看到招牌，確定要拜訪的對象在這裡，預期櫃臺有接待小姐，她將領自己去見已約好的單位領導。這一連串的過程模擬旨在說明，要仰賴預先設置好的符號，使我們得以判斷當這些符號在空間與時間上出現並表現某種狀態時，該狀態對我們是什麼意義。這是一種更加動態地透過象徵符號來觀察事物、決定意義、並決定接下來觀察視域的思維過程。

研究中最重要象徵符號是文字。研究者最常透過文字來表達對時空延續與斷裂的感知，文字作為一種抽象的象徵物，將實體轉化後帶進人的思維過程中，人也就能夠經由文字的使用來創造象徵，而經由象徵去掌握更多無法直接觀察到的現象，例如上述的國家、地心引力、或單位。再者，既然人要經過「使用」語言才學會語言，符號本身並沒有本質性的內涵與意義，意義是由於人的不斷使用才會生成與轉變，則觀察對象當然也不可能是客觀的，而必須隨著代表它的語言而改變其意義。認知心理學家已經發現，在這種被使用的文字符號背後、必然附著有情感，認知活動其實是一種記憶的搜尋，而這種搜尋在在與情感反應相

關。²²如此一來，用語言在時空上區隔出來的客觀對象，同時必須是由情感構成的，亦即沒有不引起情感反應的觀察對象。那麼，當然就沒有主觀上不介入研究對象的研究者。

情感與理性

人在社會成長過程中，不斷地將各種社會刺激和制約發生時的情境與象徵符號存在腦海裡，如同電腦存檔一樣，建立一個個的認知檔案，每一認知檔案都附有一個情感袋（affective tag），記錄了早先在內化該檔案中的象徵符號時，所同時產生到的情感反應。情感有許多種，每一種情感觸動的行為方向與強度都不一樣；當人受到外來刺激時，首先反應的就是附著於相關象徵符號的情感袋，這種反應只需很短一兩秒，之後才會再從認知檔案庫搜尋一個自我說明的理由，這個反應通常需時十餘秒。因此，情感反應往往先於認知，即認知是被情感帶動的；人對某樣刺激產生正或負面的情感反應，潛在地引導人去採取認知記憶庫中某些部分，以說明自己為什麼產生這種情感。

認知心理學另一個發現是，情感影響到人對社會刺激的接收過程。有心理學家將五花八門的情感分成三大類，分別是熱情的情感、焦慮的情感、排斥的情感，並且發現熱情的情感最能促成行動，焦慮的情感則有助於偵測環境，提醒威脅，如此生活環境中存在影響自身目的的符號，才會警覺。²³故在一次心理過程中，經常是先發生焦慮，才注意到，而不是先注意到，才焦慮。排斥的情感發生時則會驅使人去支持與自己排斥對象相對的對象。排斥與焦慮的情感有時不見得能清楚區分，需視社會情境、生活經驗與承載的歷史脈絡而定。

²² Milton Lodge, Kathleen McGraw and Patrick Stroh, "An Impression-drive Model of Candidate Evalu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83 (1989): 99-119

²³ George E. Marcus, W. Russell Neuman, and Michael MacKuen, *Affective Intelligence and Political Judg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認知心理學這些發現，促發對主客觀分立的研究主張有所反省。所謂客觀研究顯然必須建立在可觀察對象的相關知識基礎上，然而，這樣的對象（一）必須藉由選擇過的特定觀察儀器才能顯現，（二）必須在時間空間上可以由儀器延續地顯現，（三）延續的狀態必須出現斷裂，且這些延續與斷裂必須能透過象徵符號表達，（四）表達斷裂的象徵符號必須可以經由觀察者的語言重複呈現，（五）語言的背後都附著了情感袋，（六）情感袋會在觀察者接收到象徵符號的當下率先反應，影響觀察者採取認知記憶庫的某部分，來因應自己情感的方向與強度，甚至情感會直接影響觀察者如何進一步接收訊息。所以情感與觀察其實密不可分，主觀與客觀乃相互構成。

另外，最近腦神經科學的研究也顯示，情感是認知過程與理性思考不可或缺的部份。這是因為，人類的大腦在從「視神經床」（thalamus）接收外界資訊，進而產生知覺或是進一步理性思辨之前，這些資訊一定都要經過淋巴系統（limbic system）和扁桃腺（amygdala），才能到達大腦皮質（cortex）。其中，淋巴系統掌理人體肌餓、口渴、性本能等足以誘發情感的基本生物性；而扁桃腺則是直接使人類產生情感——尤其是恐懼（fear）——與過濾記憶的生理組織。因此，當大腦產生知覺意識與進行理性思考之前，視覺或聽覺接受器接收的訊息已事先被過濾和篩選。²⁴理性顯然也無法形上學式地獨立於情感作用之外。腦神經科學最近的研究無異也大力否定了堅信情感與理性互斥的主客二元認識論。

情感是從小受社會制約而來，而社會制約又與制約發生時的社會目的有關，社會目的無時無刻不在影響我們選擇性地去接受某些社會制約。在湘西工作隊的判斷裡，在都市裡成長的人，到了深山裡看到水泥地才敢往前走，但聽到蟲鳴鳥叫卻渾然不覺；在中文環境裡成長的小孩，在學會一種語言之前可以學會許多種語言，但當學會了中文而且愈

²⁴ Rose McDermott, "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 The Meaning of Neuroscientific Advanc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 on Politics* 2: 4 (2004), pp. 692-693.

用愈熟練以後，就愈無法熟悉其他語言。於是人在成長與學習的社會過程中，一方面獲得常識，另一方面卻也不斷地封鎖自己進入其他社會歷史脈絡的可能性。這種「進入」是人類社會形成的一種規範機制，引導行動者在社會脈絡中會使用什麼樣的象徵符號，會發明什麼樣的觀察儀器，以及用來觀察什麼樣的對象，而這個對象後來就變成所謂的「客觀」研究的對象。

這樣形成的對象，與其說「客觀」，不如說是被社會目的鎖住，使之成為無法動彈的對象或客體。每當鎖住一個對象或客體時，觀察者自己本身也鎖在這個客體上，因為這個可被觀察的對象，偕同發明來觀察之的各種理論與儀器，再加上重複表述用的語言與情感等等，反過來規定觀察者應該生活於什麼樣的社會目的之下。觀察者或研究者的「主體」必須要在給定的社會目的之下不斷地演練，如維根斯坦論語言那般透過實踐——找尋社會目的裡定義的「客體」，從而才能熟稔如何使用長期習得的角度或工具，去觀察社會目的引導主體自身去觀察的客觀對象。所謂客觀對象，充其量就是主體學到的理所當然存在的對象。

社會目的與行動者目的

綜上所述，觀察者的主觀情感與行動者的客觀行動，二者之間是相互構成的關係。觀察者如果失去觀察對象，意味著沒有可以與周遭的其他人互動、溝通、交往的通用符號，因而無從判斷其他人所使用的象徵符號究竟意義為何。如同都市人掉進深山蟲鳴鳥叫之中，如此也就無法有意義的生存。譬如一個公眾人物，突然被揭發出不見容社會的敗德行為，導致原本識別選民的認知失效，「選民」這樣的符號不再促發熱情；相反地，象徵選民的種種符號，反而引起焦慮。除非進入其他角色，取得別的社會目的，不然形同一種社會退化過程，大門深鎖，失去與旁人接觸的動機。

主客體之間原本由社會目的所建立的聯繫，有時候似乎可以分離，譬如有人指責原子彈研究人員的科技造成無數死傷，原子彈專家會辯稱自己無意如此，而只是從事某種專業研究，至於研究成果被別人如何使用與己無關。曾經一次金門國防演習，砲彈不小心打到廈門，國軍道歉的說法是，並非有意如此，只是練習時失誤。²⁵但仔細想想，演習的目的不就是為了在正式戰爭時命中嗎？目標不也包括廈門嗎？演習失誤只不過是在國軍還不想打的時候打到了，這就像男人在外花天酒地不小心生了小孩，道歉說是失誤，其實精子不就是用來生孩子的嗎？只是在不想生的時候生了。面對這種常見的意外，行動主體宛如置身在其外，卻同時深深地涉入被自己觀察的過程，把我與不小心失誤的我區隔成主體與客體，試圖解釋事情發生的道理並顯示自己的無辜。如此主體與客體都是同一人，揭露了一般所謂的主客體也是人為區分開的，區分的效果就是社會目的隱諱。²⁶

上述研究國防技術的人如此隱諱社會目的，其實一般社會科學家對行動者的描述也隱諱社會目的。²⁷經濟學、決策分析等理論即把行動者的目的當成解釋項，用行動者個人目的直接解釋行動原因。然而，行動者追求個人目的有獨立於個人目的之外的更大作用，即是透過追求個人目的，參與社會目的。因為，這個追求過程不但容許行動者與社會其他成員互動，也與研究者互動，他們之間得以相互確認——他們對符號象徵有共通的使用，對彼此的情感有共通的回應，使得行動者在滿足個人目的的過程中，儼然擁有了使用所謂社會客觀現實的能力。但這時，透

²⁵ 所謂「並無敵意的誤擊事件」，見〈金防部證實小金門防砲誤擊廈門〉《聯合報》（1994-11-16）：20版。

²⁶ 日本近代思想家西田幾多郎，也是京都學派始祖，意識到這樣的問題，於是致力想把西方科學哲學中的客觀與禪學結合，提出主體是無，而客體則是社會情境中的我，號稱無的哲學，在二十一世紀重新成為文獻探討的對象。Heisig, James W. (2001), *Philosophers of Nothingnes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中村雄二郎，《西田幾多郎》（譯）卞崇道，劉文柱（北京：三聯，1992）吳汝鈞（民87），《絕對無的哲學：京都學派哲學導論》（台北：商務）。

²⁷ 理性的定義就是目的導向，見 William Riker,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Rational Choice Theory," *Political Psychology* 16, 1 (1995).

過長期學習而內化的社會目的，其主觀性獲得隱藏，一切像是個人行動者自我滿足的客觀現象。

嘗聞國家至上、單位至上諸如此類的社會目的，以及界定這些社會目的的指標如國防武力、GNP、利潤等等，全都奠基於行動者追求滿足個人的目的，這些個人目的與大的社會目的相互構成，社會目的與個人目的之間的聯繫，就是所謂客觀現實。在以符號象徵所呈現的所謂客觀現實中，行動者得藉由追求自我滿足的行動而客觀地存在，但他們能鼓起充分熱情追求目標，是受到符號帶動的情感袋所影響。這個情感袋不是行動者選擇的，而是在大的社會目的下學習使用符號時內化的。故客觀不是與主觀對立的，而是社會與行動者交會的所在，譬如 GNP，是追求發展的社會與追求利潤的行動者交會之所在。「客觀的」GNP 體系一方面規定了公司利潤與稅務的計算，另一方面標示國家的經濟發展。行動者的財富價值與社會的經濟成長價值，在 GNP 上升的客觀數字中交會；但是與階級分化和性別歧視有關的符號卻無法進入 GNP 的討論，或進入就引起焦慮，甚至排斥。除了 GNP，追求經濟發展與追求個人財富兩者，都是刻板印象中的所謂「主觀」價值，忽視階級分化與性別歧視也是主觀現象。

理性抉擇

自我觀察是區分主客觀的一種形式，理性於焉成為可能。理性抉擇基本上是一種認為主觀目的與客觀手段可以分離的「科學」，研究者認定行動者有一個目的及多種手段，於是要研究行動者如何選擇其中最適手段來達到目的，所以手段與目的都被講述成是「客觀」的研究對象。行動者自我觀察的意義，就是為自己設想如何客觀地達到目的。理性抉擇的特性在於，從不問行動者的目的為何是存在的、有意義的、可被追求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必須有更大的社會目的來認可理性行動者的個人目的。

理性抉擇的行動者處在特定社會目的下的時空秩序中，每次選擇行動方案就是選擇與社會互動的方式，因此每次選擇，都必須仰賴社會既有的符號象徵，從而鞏固既有的社會現實。所以，社會目的制約了選擇行動方案的過程，這個過程制約了理性抉擇，理性抉擇制約了客觀主義，客觀主義制約了行動者與行動對象的區隔。

然而，早期的理性抉擇其實是以情感為基礎的，是當代的理性抉擇背離了這種情感基礎。直到某些數學家與經濟學家開始以排序或測量來評估內在偏好的效用之前，理性抉擇其實是以情感來衡量效用的價值。例如，五〇年代的經濟學者還認為，人們是以痛苦或愉悅作為效用的衡量標準。可是，現在的經濟學者以及從事理性抉擇研究的政治學者大多認為，極大化利益與極小化代價才是人們效用追求的標準。正如一位政治心理學家所說，「某種程度上，排除情感的當代預期效用理論模型背叛了他們的知識傳統」。²⁸

因此，自我觀察者的每個環節都聯繫著情感與社會目的，自我觀察者先對自己的行動目的有熱情，才能讓觀察過程能夠發生。觀察過程的發動確認了所謂社會客觀現實的存在，於是紓解了焦慮，此一所謂的客觀現實反射了大的社會目的，則社會目的獲得鞏固。個別行動者的行動目的其實反而像是鞏固社會目的用的工具，這個個人目的敦促行動者評估行動方案，也就必須在時空中切出延續性的斷裂，斷裂的符號既然帶有早先形成的熱情，就促成選擇行動，有了行動後，行動的結果就可以歸類到社會目的下，社會便繼續存在於既有的延續性斷裂之中。每個社會之所以為社會，在於社會成員具備某種共享的社會目的，據以切割時空成為所有成員行動的共同對象，經由共同的符號建構出社會制度，促發共同的情感。簡言之，所謂主觀的社會目的，是所謂客觀的理性抉擇的前提，也是結果。沒有一種客觀行動不是透過主觀的實踐引導而發

²⁸ Rose McDermott, "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 The Meaning of Neuroscientific Advanc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 on Politics* 2: 4 (2004), p.699.

生，沒有一種主觀目的可以不依賴在空間時間上延續並斷裂的象徵物，來作為它的對象而表達。

代結論：研究者與行動者的共謀

文化研究立場下的研究者，無一不也是行動者，故研究者與行動者的地位平等，同為意義的來源。行動者與研究者都是觀察主體之所在。行動者的主觀反映在對個別目的之追求上，研究者的主觀反映在對社會目的之認可。他們之間的溝通，構成所謂的客觀；研究者宣稱掌握行動者行為通則的語言，也構成客觀。行動者為了個別目的對社會時空進行切割的方式，與研究者基於社會目的對社會時空進行切割的方式，兩者之間享有互通的符號與情感。不過，他們之間經常的互動透露出，所謂的客觀現實並不能與主觀分開。

譬如，從藝術家與科學家分別對雲的需要出發，藝術家要透過雲的意境反映社會的情感狀態，科學家要透過雲的測量貢獻於社會對自然界認識。又譬如，宇航員看到山川河流，與觀光客或外交家看到的不同。這麼多不同社會位置的人在自己個人的研究觀察過程中，也都是某種程度的行動者；當他們與自己身分位置相同的人彼此溝通時（外交家與外交家，觀光客與觀光客，宇航員與宇航員），進入到行動者與研究者之間的模糊地帶，看別人如同看自己，研究者如同行動者，如此間接但有力地對於與同僚們所共享的社會目的，起著相互確認的效果；但不同社會位置的他們之間（外交家，觀光客，宇航員），一旦發生彼此溝通時，就都成為觀察旁人的研究者，往往要求對於不同社會目的之下、採用不同觀察工具、進行不同時空切割、從而帶動不同情感反應的旁人（包括其他研究者與被觀察的行動者），能將他們用的符號象徵，翻譯成自己所熟悉的符號象徵。

每一個行動者都也成為研究者，學院裡專門研究行動者的社會科學家，則永遠不能脫離研究者的角色，但他們的工作，與其他行動者偶爾扮演的研究者不同，偶爾的研究者只會片面責難其他的行動者時空錯亂，或缺乏知識，要求他們改正，社會科學家則必須主動將其他行動者的符號象徵，翻譯成自己熟悉的符號象徵。能翻譯成功，主客觀的區隔的感覺或立場便得以維繫；不能成功時就必須進行管理，於是可能採取行動，對所研究的行動者進行思想制約與改造；或反省自己的社會目的，發展另一種切割時空的符號；或乾脆拒絕行動者進入可識別範圍；或進行定義上的修正，技術性地誤譯行動者的動機。對社會科學家而言，維繫自己超越於社會現實之上的客觀地位，是最根本的行動意義，也是社會科學家的社會目的。

Not About Objectivity — A Note on Cultural Studies Perspectives

Chih-Yu Shih
Yi-Tsui Tseng
Min-Jay Guo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cultural studies critique of objectivism. It confronts the mainstream social science on the issue of objectivity. Through analogy and deduction, the paper denies the existence of any research target to be completely unrelated to the researchers or their research activities. Researchers identify their research targets because these targets extend themselves in time and space but separate abruptly from their surroundings. Extension and abruption are observable through the creation and use of symbols, which involve social learning. Learning is a matter of social purpose, which injects affect into the memory of symbol. Consequently, researchers and their targets are mutually constituted in

the knowledge concerning social reality.

Keywords: social science, objectivity, subjectivity, epistemology